

对《也谈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史》的回应

李金华

《经济学动态》转来乌家培先生《也谈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史》一文。乌老就笔者的拙文《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一些质疑,现回应如下:

1. 乌老认为,将1980年的“颐和园讲习班”视为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是不合适的。事实上,我在文中的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就叙述了乌家培、张守一先生等在20世纪50年代,以数学方法进行经济活动和经济学现象的研究,并且特别说明“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数量经济研究活动”可见,拙文没有否定这些学者们对数量经济学的贡献。

至于将“颐和园讲习班”认为是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是基于如下考量。通常,一个学科的源起是有一个标志性事件的,如代表性人物的代表著作、代表文章等,正如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一样。那么,谁的代表性著作或代表性文章标志着中国数量经济学的诞生呢?对这一问题,中国的数量经济学界至今没有任何说法,拙文无意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1980年的“颐和园讲习班”在中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这是2010年夏在北京召开的“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30周年纪念会”上一些学者的认识,拙文接受、认同、承袭了这一说法。认定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并不意味着就否定中国数量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60年代进行的数量经济学研究工作。拙文通篇找不出一个贬抑、忽视中国数量经济学家贡献的文字。

中国数量经济学在20世纪50—70年代就有早期的研究活动,至1980年出现了“颐和园讲习班”这样一个标志性事件。正如斯密前就有经济学思想和经济研究活动,至其《国富论》发表,才标志现代经济学诞生一样。可见,拙文的行文和认知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2. 乌老认为,不能忘记孙冶方、于光远、马洪三

位老一辈经济学家对创立和推动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历史功绩。正如乌老所说,孙冶方、于光远、马洪三位老一辈经济学家对创立和推动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是有重大历史功绩的。拙文中提到许涤新教授,只是说他邀请克莱因教授率团来华讲学,仅此而已,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是行文的需要,并无褒扬许老,而忘记孙、于、马三位经济学大家之意,事实上拙文中也提到了马洪教授的文章。

再者,拙文不是纪念性文章,也不是讲话稿,不需要在文中进行功过评说,提到谁不提到谁,完全取决于文章的主题和行文需要。提到了谁,不意味着就是赞美谁;没有提到谁,并不意味着就是忘记了谁。

3. 乌老认为,不能否认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工作及其成果。本文一开始就叙述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乌家培、张守一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数量经济学家进行数量经济学研究的拓荒性工作。而且,根据需要拙文在各部分都提到了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投入产出分析、经济数学方法应用成果等。可见,拙文并没有否认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也没有忽视我国数量经济学研究起步时在向苏联学习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

文章是无法就乌老所提的问题展开论述的,因为文章的主题不是专门论述数量经济学的历史,不是要褒扬谁,贬抑谁,也不是要进行是非功过评说。特别是文章有篇幅的限制,不能面面俱到,相信广大读者能理解。文中的叙述是个人的学术观点和认识,本人欢迎讨论和批评。所幸的是,拙文所述史实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都是真实、准确、客观的,故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

由于篇幅限制,笔者只能做出简单的回应,不尽之处,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本人的原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谭易)